中國教會：廿五年的更新

沙百里著　陳愛潔譯

報章和電視所提供有關中國天主教會的資訊，可能給歐洲（及其他地方）的讀者，對中國的宗教狀況留下一個相當負面的印象。主教和神父持續被當局拘捕，甚至聖堂遭破壞的事件也頻頻發生，讓人覺得中國的基督徒常常受到迫害。

由於很多讀者有興趣知道所有極權統治下異見者的一舉一動，這助長製造一個形象，就是忠於羅馬的理想地下教會，對抗與中國共產黨勾結的愛國教會。

這些形象縈繞在很多歐洲人士（西方人士）的心中，是需要糾正的。讓我們從一開始說得清楚。在中國沒有兩個教會，沒有一個「愛國」教會，只有一個天主教愛國會，負責與政府機構連繫，並確保教會尊重官方的政治路線。

如果那些繼續使地下和官方教會成員之間互相反對的衝突至於互相排斥，我們顯然要爲此而感到遺憾。這是反見證，否定基督宣講彼此相愛的福音。另一方面，這種相異的方向的混合，說明基督徒的訊息，要求既入世又出世。地下的成員維護信仰居於首位，並且忠於教會。官方教會的成員則努

力融入他們的社會及其文化。他們都有可能在廣大非信徒中間顯示基督徒價值觀。

新一代的極大努力

基督新教的信徒也有自己的問題，但他們較少依賴他們的牧者，亦較少因法典規則的問題而動輒爭吵。他們把教訓集中於接受耶穌爲救主多於教會的法律。他們的聖歌較簡單，也較接近人民的生活。他們的傳統教會也屬於三自愛國運動管轄，但他們的傳福音者得到美國和台灣支持，表現出非凡的活力，比地下天主教徒的見證更加生氣勃勃。在很多非正式聚會地方，他們同樣遭受警方突擊搜捕，而他們的領袖必須繳交罰款或入獄。在一九五零年，基督教徒的人數遠低於天主教徒。今天，他們的人數多於天主教徒。一些天主教主教欣賞他們的福傳成就，希望自己的信友會表現出同樣的活力。

事實上，在中國的許多地區，新一代的年輕司鐸和修女在教會生活的不同層面，見證一種勇敢的朝氣。他們出色地成功實行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禮儀改革。直至一九八二年，上海修院才開始發現大公會議文獻。其實，自一九六五年起，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已採用中文來舉行彌撒和聖事。但是，在中國，所有禮儀慶典仍舊採用拉丁文。正如三百年來所做的一樣，神父背向信友，低聲地舉行彌撒，而信友則吟誦文言文的經文。

今天，基督宗教不再被視爲外來的宗教。共產政權已給予基督宗教很大的幫忙，使它成爲中國其中一個獲認可的宗教，職位全部由中國人擔任。此外，基督宗教被視爲與現代事物連繫起來，喚醒個人的良知，並尊重人的位格。某些知識份子，例如陝西的姚西林甚至認爲，對現代化所引起的偏差來說，基督宗教是不可或缺的矯正方法。某些馬克思理論家甚至能夠重新解釋馬列思想，說明這些共產主義的支柱並不常常把宗教形容爲「人民的鴉片」，而中國共產黨因忽視宗教在支持社會生活、文化及倫理道德的作用，結果是使人民離開正道。但是，

保守派還是保持警戒，禁止幹部信奉宗教。他們所持守的觀點是，在科學和政治兩方面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是不可沉醉於宗教幻象的。這眞是馬克思信念，抑或只不過是「敬而遠之」這古老的儒家人文主義的持續？

年輕修女的人數甚至比年輕司鐸的更多。現時在全國各地約有四十所初學院。由於她們大多數是來自貧窮的農民家庭，甚至還未完成中學課程。她們屬於近年由中國主教創立的修會，或者屬於國際修會，例如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拯望會、聖母獻堂會、耶穌聖心會、聖神會等。她們不可屬於總會長一職設於海外的國際修會。事實上，她們的長上是教區主教，或者是她們被派往服務的堂區的主任司鐸。她們的院長的權力實際上已被削弱，而她們獲派的工作，經常是謙卑僕人的工作。主教們花了大部份金錢來重建聖堂，卻只撥出很小部份來照顧修道人的生活和培育。然而，爲滿足社會的需要，有些修女已受訓成爲醫生和護士。來自台灣或香港的修女協助她們組織得更好，和更理解自己的聖召的屬靈層面和要求。香港教區教理委員會的委員亦曾週遊全國各地，使年青修女熟習較活潑的教理講授方法，而不只是純粹背誦經文和教理問答。

修女不像很多神父那樣，主要依賴外國捐款，或運用基金來興建聖堂或開拓與教會相關的事業，她們具有較獨立的精神，而且較少受外國人影響。由於她們管理幼稚園或診所，總算能夠勉強維持生活。她們也藉著穿便服而展示獨立，因爲這些服裝比較長裙更適合她們的日常工作和地方習俗。相對於神父們浪費了很多精力在「官方／地下」衝突，修女們卻傾向對各方保持開放。她們在教區層次得到承認，卻爲那些在地下環境工作的團體受到歧視而感到遺憾。但是，她們十分意識到政治的限制，所以避免與政府當局對抗。無論如何，修女在教會的聖統制內沒有任何權力，所以政府很少理會她們。這樣，她們享有較多自由和時間，可從事各種活動，推動教會走出封閉的世界，向非基督徒開放。

這種彈性有助減少教會的日常活動受到政治干預，也間接幫助神父在政權的壓力下立足。修女透過兒童、病人和老人，接近當地的家庭；她們經常探訪家庭，接近人們。她們懷著勇氣和奉獻的精神，再一次肩負起於十八世紀創立的「中國貞女」在過去兩個世紀所擔當的角色。她們給婦女和兒童的服務對中國教會的生命力是不可或缺的。

與普世教會團結共融

中國在這廿五年來向世界開放，容許進行宗教交流。這一切當然有助維持教會的士氣；因爲教會曾覺得自己孤立而處於岌岌可危的境況。幸虧上海主教的倡議，以及一些熟悉中國的傳教士的支持，在過去二十年，約有一百名司鐸、修生和修女能夠在美國、歐洲及菲律賓等地供讀神學。基於某些原因，在海外旅居期間並非沒有遇到困難：由於修院自一九八二年重開以來還缺少宗教學，所以資訊不足；在傳統天主教團體的熱情與西方十分世俗化的教會生活之間有著時間的落差；中西方之間容易產生知識衝突，因爲中國的思想方式總是關注人與自然及社會環境之間的和諧，而西方邏輯則以抽象和批判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另一方面，無論他們的學業有多麼成功，海外的神學生卻生活在一個對宗教毫不感到滿足的世俗環境裡，經驗一個更需反省的信仰。這樣，他們更能認識到基督信仰予人生的支持，並準備在中國日益發展的物質社會中作見證。能夠在中國講授神學、禮儀、聖經的教授，都從台灣、香港及其他地方應邀來中國各地的神學院講學，以彌補教授人員的缺乏，好能推廣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所鼓勵的改革。其中一位教授，即原籍上海的慈幼會士陳日君神父，能夠在上海佘山修院教書。他後來成爲香港教區主教。他一直繼續讓人知道天主教會就在人格和社會倫理道德等方面的立場。自從香港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中國主權後，他一直支持香港的民主發展。此舉卻令北京當局感到不安，因爲他們不願看到在國家的門階有民

主的立足處。幾年來，他一直被禁止訪問大陸。然而，在二零零五年四月底，他獲准訪問上海幾天，與家人團聚，並往佘山的聖母大殿朝聖。

近年畢業的年輕神父在歐美生活了一段時間後回國，便面對另一個問題，即他們在較自由的氣氛下所體驗的事物，跟他們將要在古老而保守的精神權威下，或在諸多限制的政治秩序下完成的事，兩者之間所產生的問題。至於仍留在國內的同事，則擔心這些回國的神父會接任教區最引起興趣的職位。一些（剛來到的）已不能承受打擊，於是離開鐸職。不過，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提供出色的服務，經常出任神學院教授或修院院長。他們中有些人更見證充沛的精力和富有希望的倡議。在北京，取得魯汶大學博士學位的趙建敏神父爲大約四十個已精通一種外語的大學生，開辦有關基督徒文化的入門課程。他所聘請的十位教授，都是從美國畢業回國的年輕神父。在河北省府石家莊，曾在菲律賓受教育的張士江神父則擔任《信德報》主編；他在把報紙刊登在互聯網上，並成立一個類似歐洲「明愛」的社會服務機構。在西南部的昆明，年輕的陳開華神父雖然沒有到國外進修，但在中國學術圈內亦是很有名的。一九九八年，在杭州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上，他發表過去三百年來的天主教中文著作書目。二零零三年，他在履行日常牧民職責之餘，還舉辦一個以雲南省人民生活爲主題的攝影展，吸引很多人參觀，並與省內的基督徒少數社群建立連繫。

在國家層面，二零零三年三月至十二月期間，約有四十位已晉鐸十年的神父參加北京市大興區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舉辦爲期一年的持續培育課程。在中國的天主教會，最合資格的人正逐步有能力確保在本地培育司鐸、修女和教友，還考慮到與來自科學院或大學、正在詳細研究基督徒神學及基督宗教歷史的非基督徒知識份子對話。

在學術層面，研究、出版和不少交流活動都在進行，尤其在國內或海外舉行的研討會上。東西方關係的歷史都在這些聚會構成特別的元素。中國的

研究員正致力研究十七、八世紀的傳教士所作出的貢獻。可是，除英語以外，這些研究人員並不認識拉丁文、法文及歐洲語言，因而感到困窘。他們希望能夠逐步安排一些專家在歐洲的學院逗留兩年，使他們能夠查閱傳教會的檔案文件。比利時、德國和意大利的天主教修會一直支持中國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考慮到法國傳教士——耶穌會、巴黎外方傳教會、遣使會等——過去三百年來在華的傳教活動的範圍，法國可在這方面作出更多貢獻。的確，在殖民時期，傳教活動有相當大的發展，這傾向於令到在較和平時期與中國之間的豐富交流變得模糊。更不用說，中國的研究人員傾向於研究十九及二十世紀基督宗教在華的歷史。馬克思對歷史的解釋仍使人無法客觀地研究某些課題。因此，講授文化或比較宗教的中國教授已組織一起，翻譯大量西方當代神學家的著作。他們從歐洲神學獲得一種對歷史、人類的痛苦、人類救贖——即人類從邪惡的奴役中獲得解放——中悲劇的戲劇感，而這許多的元素似乎是中國的世界觀所缺少的。

我們稱這些知識份子爲文化基督徒，但他們似乎沒有歸屬教會的念頭。不過，由於傳教會對中國的服務，由於香港的聖神研究中心，由於自一九八六年起在新加坡出版的中英文版《中國天主教指南》等，外國信友與華人之間的人際交流已有所增加。第六版的《中國天主教指南》的增加了很多內容，包括某些聖堂的地址、超過一千個電話號碼，以及主要的天主教中心的電郵地址。互聯網也是交流的媒介，尤其在這些年間更以驚人的速度發展。今天，中國的天主教網站或在石家莊，或在香港道風山的基督教叢林，或在天亞社等機構在線。有關中國教會現況的資訊可經由法文版《亞洲教會》雙週刊（*Eglises d'Asie*），德文版《中國教訊》月刊（*China Heute*），英文版《中國研究項目》季刊（*China Study Project*），意文及其他語文的《信仰》（*Fides*），《亞洲新聞》（*Asia News*），以及《世界與傳教》（*Mondo e missione*）等刊物傳播。

「百聞不如一見」。基督徒遊客能夠參與本地的中文彌撒，並與主教、神父和教友見面。這些相遇給旅遊和商業圈子增添傳教的層面：即使在廿五年持續開放之後，中國的基督徒依然從來自其他國家的基督徒友善和支持的臨在而得到安慰。這幾年，中國的天主教團體正逐漸從貧窮的鄉村出來，在城市中心發展。能夠往歐洲旅行的基督徒渴望到露德、里修、羅馬等地朝聖。現時有越來越多中國遊客前往巴黎的聖母院、瑪利亞瑪達肋納堂和聖心堂參觀，更可閱覽中文的導遊書籍。

數以千計沒有宗教信仰的中國學生在歐洲的大學深造幾年，他們應該得到同樣的歡迎和資訊服務，這正是當地教區需要考慮的。在法國里昂、昂熱、布雷斯特、普瓦捷、波城、格勒洛布爾，當然還有巴黎等地，一些神父已意識到這項工作的重要性。這些神父即使不認識中文，但可以邀請一些講法語的中國義工，也可以從香港、台灣、新加坡、上海等地入口彌撒經書、聖經、教理講授以及各種著作。由於在這些學生當中，有不少人希望接受基督信仰的教導，所以，爲他們建立一套特別的教理講授課程是重要的，因爲他們的問題和興趣有別於那些在本地慕道班招收的慕道者。不論他們的動機如何，中國人接觸福音的途徑是建基於友誼、尊重和互信，並藉著祈禱、禮儀、聖歌，以及聖女小德蘭的靈修。對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而言，科學與信仰之間的關係可能構成問題，這也許因爲他們在中國學校接受教育。然而，相比很多歐洲人士，他們較少對宗教反感。

讓我們簡短地總結：現時由經濟法則促進的全球化過程也必須具有人性的、道德的、社會及文化的層面。爲此，建立一個全世界公認的倫理基礎，中西方之間的更豐富對話是非常重要的。互相的開放和溝通的方法從未如此自由先進；不要讓我們的人性缺點和基督徒的軟弱成爲我們溝通的障礙。□